

史志琼崖·清风海南



海口市海瑞故居前的「南海青天牌坊」资料图

学林一叶

【编者按】

苏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王水照今年已经九十有二，自1958年开始接触苏轼的作品，此后长期研究至今。2025年，其《王水照苏轼研究文存》被收入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东坡文库”丛书第一辑。王水照研究苏轼“一人之学”成果丰硕，钱锺书先生生前对其赞誉有加：“卓然优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学。”

### 苏东坡异代知音王水照 以一人之学 成一家之学

■ 梁燕妮

苏轼，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千百年来“圈粉”无数，但若要说他的当代知音，王水照先生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王水照 1934 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在这座人文荟萃的古城中度过了少年时光。1955 年夏天，21 岁的他从千余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名师宿儒的熏陶中开启学术生涯。

王水照的东坡研究缘于三次文学史编写的经历。1958 年，他作为北大中文系 1955 级学生参编《中国文学史》，承担宋元段的编写工作，自此开始接触苏轼作品。次年，王水照又参与该书的修订，负责同一章节的整理。1960 年，王水照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在何其芳、钱锺书、余冠英等先生的指导下继续钻研学术。这一时期，他再次承担《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任务，执笔苏轼一章。这段经历带给王水照的经验无比深刻，长久影响着此后的学术理念。

每当忆起这段往事，王水照都感叹学术研究中坚守主体意识的重要性，认为独立思考、保持自我是学术创新的根本。这些理念推动着他读苏、治苏的兴趣，引导他在“苏海”中不断遨游。

王水照曾将新时期的苏轼研究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第二阶段是作为文学家的苏东坡，第三阶段是作为文化范型的苏东坡。他的苏轼研究历程正是按照这样的路线展开的。

王水照曾于 1978 年发表《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诗》（《文学评论》1978 年第 3 期）一文，将苏轼在熙宁变法中的政治观点置于时代发展、阶级冲突的大背景下进行评价，客观而理性地展现出苏轼的真实形象。

在厘清苏轼真实的政治态度之后，王水照又深感他作为文学大家的重要意义，因而致力于揭示其在宋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为此，王水照编注了《苏轼选集》，先后发表了《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和评价问题》等论文，以散点透视的方式考察苏轼的创作面貌，解决了学术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

尽管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王水照的苏轼研究已经取得突出成绩，但他对苏轼的认识并不止步于政治和文学的单一层面，而是继续向前探索，将苏轼作为一种文化范型加以考察。

1989 年，王水照发表《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9 年第 5 期），勾勒出苏轼人生思考的路径，总结出其文化性格的内涵，并由此导向对整个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性格的探讨。1991 年，王水照又发表《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文学遗产》1991 年第 2 期），从微观视角切入，选取苏轼和辛弃疾生平经历中较为重要的一个侧面——退居生活作为焦点，考察两人对陶渊明精神品质的不同取舍，由此发掘其在思想、个性上的相异之处，从而细致展现出苏轼文化性格的具体内涵。

王水照的苏轼研究路径经历了从政治家身份到文学家身份再到文化范型的转变，其著述体裁则相应呈现为专题论析、作品选集、人物传记、作家年谱四大类型，显示出文学史、思想史与文化史彼此交通的治学风格。

《苏轼选集》集作品编选、史料汇集、疑难辨析于一体，具有“详而不芜，博而得要”的编纂风格，被学界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钱锺书先生高度评价赞扬：“卓然优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学。”

王水照曾将自己的学术之路概括为“四个一”——“一代之学”，即宋代文学研究；“一人之学”，即苏轼研究；“一体之学”，为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一生受惠之学”，为钱锺书研究。

如今，王水照虽已年过九旬，但仍笔耕不辍。他总是一边手持放大镜，一边在书中圈圈点点，沉浸于学术世界中。与他交谈时，他总能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学林旧事细细道来，令人仿佛置身于那段书香缭绕的岁月。倘若谈及与苏轼有关的话题，他的兴致会更高。最近，他计划编纂《校补宋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作者系文学博士、四川大学特聘副研究员）



《王水照苏轼研究文存》书影。

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南溟奇甸”的海南岛，经唐宋两代的治理开发，特别是历代名臣登岛后的沾溉滋养，明代的琼州大地已有“海滨邹鲁”之美誉。以蜚声海内外的海瑞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菁英，其耿介个性与廉洁精神不仅夺目垂范于古代，也光耀启迪于当代。

【编者按】

为此，海南日报文化周刊文史版将推出“史志琼崖·清风海南”栏目，讲述海南历史文化名人清正廉洁的故事和他们得以传颂至今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境界。

孟子云：“居移气，养移体。”海南古代士大夫的精气神，实则离不开海岛的地气和文脉。海瑞这座令后世高山仰止的道德主峰，正是矗立于明代海南文化大发展的群峰之上。万历《琼州府志》记载了这一盛况：“迨于我朝圣圣相承，薄海内外，咸建学宫，遴选硕师以专教道，是以贤才辈出，有进列六卿位八座者矣，有视草玉堂兼信史者矣，亦有明习经史，登铨籍者矣。”

在这股“贤才辈出”的历史大潮中，早在海瑞之前，大明王朝的星空中便已闪烁着邢宥、丘濬、王佐这三位琼崖贤人的星光。他们的人生轨迹虽各有不同，但骨子里那份耿介与对清廉的坚守，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性格底色中的“耿直狷介”与庙堂之上的“清正廉洁”，究竟是如何跨越个体的偶然，成为明代海南士人一种群体性精神特质的？

#### 御史巡按邢宥 仗剑执法 刚直不阿

“耿介清廉”并非单薄的定语，更不是一道灰色的戒尺，这四个字打在不同的人身上，会发出不一样的光彩。回望明代，邢宥、丘濬、王佐三贤，先后渡过琼州海峡，步入中原仕途。在明代错综复杂的政治版图中，他们官阶互异，际遇有别，却将源自海岛的“耿介”，化作各具风骨的廉政底色。三人之中，成名最早的乃是正统十三年（1448 年）的进士文昌邢宥。在他的身上，留存着海南士人最原始、最刚直的品性。

这种刚直，是海岛独特生存环境与文化基因的折射。西汉名臣贾捐之在《弃珠崖议》中，将海南视为“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的险地，斥其先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因当时“其民暴恶”“率数年一反”，汉室最终下诏罢弃珠崖。然而，正是这片曾被中原王朝视作化外之地的绝境，让岛民免受世俗礼法与官场圆滑的过度雕琢。《隋书·地理志》载其民“质直尚信，勇敢自立”，明代海瑞亦谓家乡“民性直而不文”。这种在蛮烟瘴雨中淬炼出的抗争血性与原始质直，化作了邢宥步入官场时最坚硬的铠甲。

带着这股海岛的猛犸，邢宥迎头撞上了明代险恶的政治漩涡。景泰初年，专权太监王振伏诛，朝野掀起大肆清算其余党的狂潮。有人趁机图财，诬告王振亲信孙太安藏匿巨资，牵连二十余人下狱。朝廷命邢宥与锦衣卫同审此案。在当时群情激愤的狂热风向下，顺水推舟定罪不仅能迎合朝野，还能借查抄中饱私囊。锦衣卫官于信主张不经详查直接定罪，并强横威胁：“不然，祸立至！”

对于毫无根基的海岛边臣而言，随波逐流本是保命之道。但邢宥查核

发现此乃图财诬告，他掷地有声地反驳：“无其情而文致于法，是我杀之也！岂可避祸而文致人罪耶？”他坚持用证据说话，最终查明此案纯属诬告，硬生生从刀斧下保全了二十余条无辜的生命。

他不迎合权贵，甚至也不迎合狂热的民意，只坚守法理的底线。这种不讲政治投机、只认死理的耿介之气，正是海岛士子在污浊官场中令人生畏的铠甲。

对抗特务政治需要血性，打破官僚僵局则需悲悯的担当。成化二年（1466 年），邢宥以左金都御史巡抚苏松诸府。江南突发大水，饿殍载道。按大明律例，开仓赈灾须层层上奏，擅发官粮等同专擅之罪。面对灾民哀号，深谙规矩的僚属多闭门枯等。此时，邢宥身上不受教条束缚的魄力再次显现。《明史》载，他看着嗷嗷待哺的灾民，断然决定“不待奏报，发米二十万斛赈之”。他押上身家性命，抢在公文流程之前救活数十万生民。法例固然森严，但生民重于泰山，他宁肯抗旨死罪，也绝不做僵化的官僚。

除了敢于逆鳞，敢于担责，邢宥风骨最坚卓处，在于他对权位的决绝。成化五年（1469 年），正值仕途通达，年逾知命之时，他目睹朝政日非，毅然“连章乞骸骨”，十次上疏坚决请辞。他笃信“廉者，政之本也”，致仕南归时“囊橐萧然如书生时”，不携一毫公物。隐居田园后，他躬耕自食，足迹不入公门。

邢宥以其一生，铸就了明代琼州廉吏刚直不阿的第一座丰碑。

#### 内阁大学士丘濬 经邦济世 清寒守正

在内阁重臣丘濬的身上，海岛的耿介和清正跨越海峡，涌入大明王朝的权力之巅，化作了朗朗庙堂的清辉正气。



丘濬画像。资料图

## 耿介清廉起琼崖 南溟奇甸育英才

郭利成

人“刚硬”的骨骼，那么中原的儒家文脉则为他们注入了“济世”的灵魂。琼州海峡曾是一道护城河，守护着岛屿原始的野性；但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它更成一根连通华夏道统的文化脐带。自唐宋时期的名臣谪居海南、讲学明道以来，孤悬海外的荒服之地渐染衣冠礼乐。那些曾点缀在文化荒原上的点点绿意，至明代已蔓延成片片浓荫。

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丘濬，正是这海岛地气与中原文脉共同孕育出的参天巨木。丘濬在《南溟奇甸赋》中回顾了这片土地的变迁，他以此地曾是“骆越之域”“荒服之外”为叹，更以中原移民带来的“衣冠礼乐彬彬然盛矣”为荣。接受了中原文化熏陶的海南士人，从此在地理故乡之外，拥有了一个魂牵梦绕的“精神故乡”——那便是以儒家道义为核心的中原道统。在丘濬身上，中原文脉的滋养结出了“经邦济世”的宏大格局。身为位极人臣的理学大家，他不再局限于一城一池的治理，而是耗尽心血撰写百余万字的《大学衍义补》。

明代中叶，宦官势力渐炽，权力网络盘根错节，士大夫多有趋附，丘濬却始终保持着距离。据《明史·丘濬传》载，他“性峻洁”，不与中官往还，亦不为其作诗文酬答。在礼部任上，凡涉典礼、选官之事，多持公论，少所依违。他历仕英宗、宪宗、孝宗三朝，位至大学士，却未尝营私植党。

丘濬为人寡言少交游。他居处京师时，家居狭小，《明史》称其“居第隘陋，仅蔽风雨”。以大学士之位而不营宅第，在当时并不多见。他一生财富唯有留给后人的数万卷藏书，清寒之风名动天下。中原文脉给了他治国平天下的旷世奇才，而海岛的质朴与刚直，则让他彻底免疫了京城名利场的奢靡与腐化。他走后，朝廷赠谥“文庄”，赞其“持躬廉介”。



临高县皇桐镇透滩村，当年官府为王佐所立的“礼魁坊”。资料图

笔砚清玩

## 李嵩《货郎图》 宋代风俗画代表作

■ 缪士毅

人物动作和心理的刻画，生动而自然。在构图方面，也疏密相间，十分得体。同时，

绘画笔法颇具特色，画货担上的物品用笔如丝，笔笔中锋，密而不乱；人物刻画细致

精致，如绘人物衣纹则用颤笔，转折顿挫，恰当地表现出乡村妇女、儿童身着布衣的特色，将他们惟妙惟肖地呈现在画面中。整幅画面人物虽多却聚散自然而疏密有度，气脉贯通而富有韵律。

李嵩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为木匠，后为画院待诏李从训养子，随从习画。李嵩历任光宗赵惇、宁宗赵扩、理宗赵昀三朝画家待诏，擅画人物、佛道像，传世名作有《货郎图》《西湖图》《花篮图》等。宋代风俗画盛行，《货郎图》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创作于嘉定四年（1211 年）。



宋代李嵩《货郎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文史荟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